

新加坡

一个新崛起的岛国

□康瑶 译

新加坡，从英国人斯特姆福德·莱福初次登陆开始，便立刻走上一条成功之路，尽管曾被太多的不利因素所阻碍，但它最终获得了成功。这个小岛没有任何资源——没有食物，没有空间，没有原材料——除了人以外一无所有；而225万人要在这里衣食住行。当今新加坡的居住者们却以一种近乎于奇迹的经济状况使世界感到震惊。在亚洲除日本外，他们拥有最高的人均收入；他们的经济增长之快甚至使很多西方国家都颇感嫉妒；这个城市已经成为世界第四大海港；它正在很大程度上取代香港而成为亚洲的金融中心；这个国家中没有人失业。除此之外，它还避免了侵袭着一些“发达”国家的灾难；它的名誉从未被腐败所沾污过，吸毒问题更是极罕见或是根本绝无仅有的，它的犯罪率在逐年减少。全部人口中的半数居住在政府公寓中，这个岛国甚至从未经历过从国家出现就存在的最可怕的灾难——人口爆炸。

这一切都从何而来呢？正象约翰·肯尼斯教授在《不确定的时代》（伦敦，1977）中指出，不能把新加坡的成功随随便便归功于它所处的位于东西方十字路口的重要地理位置。苏伊士和巴拿马——尤其是后者，也处于洲际重要连结地段，但它们并不像新加坡这样繁荣，我们该看得远些，去考察新加坡不同寻常的多种族社会的稳定性。中国人，马来人，印度人都在新加坡工作——比他们在英国殖民统治时工作卖力得多，不仅仅因为有优厚的薪水，更舒适的居住条件，以及更多使其后代充满希望的机会，而且因为他们的生活与生活在别方土地上的祖先的后代相比，缺少那种压力的因素。例如一般在新加坡工作的印度人收入是他们在印度的穷弟兄们的9倍，并且不再受专制统治的折磨。

三个说不同语言的种族的融合产生出一种强大的而且基本上是无拘束的凝聚力，说汉语的中国

人，给新加坡带来艺术和古老传统的组织经验。马来人提供了传统的手工艺和服务业。印度人则为商人、律师或其它专业性人员。

在新加坡，公费和自费是相辅相承的，当然，这是对于工人的可得性和经济的可容性来说。当别国的人们谈论收入政策时，新加坡的经济学家和商人、工会负责人们定会打哈欠，因为他们多年来一直干得很好。

在新加坡有没有计划性，有没有社会主义呢？回答是肯定的。住房、港口工作、交通运输、经过培训的人或其它需要的事物，均由政府提供。个人利益是一种很好的动力，但它在新加坡并不被认为可以达到一切目的，只有在精心设计的全面的有计划的范围之内，个人利益的刺激才能起到最大作用。

新加坡逐步成为东南亚最大的车间。这已开始运筹。以供应马来西亚为目的，1961年建立了经济发展理事会，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政府辟出成百万元用于水电供应、筑路和清除旧厂厂址、电器、金属结构、自选器械和柴油机厂等厂陆续建立。到了1954年制造业比重已超过历史性的转口贸易，和转口贸易所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相比，制造业占到12%。

教育的砝码加重在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的培训，而非公务员或售货员。台湾和南韩可提供便宜的劳动力但新加坡的劳动力更具优势——例如他们具有熟练的英语水平等。这个小岛的海港在亚洲除香港之外是无可比拟的，到1967年港口承运量已超过伦敦港。75%的船货是石油，因而新加坡虽不生产石油却在石油上颇为富有，有四个炼油厂用来加工从波斯湾运到日本和澳洲的原油。

杰出人物统治论是新加坡教育系统的主旨，它被用来帮助创造这个小小的共和国所需要的财富和管理能力，加之双语制充当着这个多种族社会的粘合剂。从上学的第一天起孩子们就被分成快慢班。这可以使来自相同社会经济背景的孩子聚到一起，这种分班制一直贯穿于整个教育生涯。对于那些有能力的，大学教育将使他们获得教育部颁发的某种证书，而那些没有通过更高级分班考试的则被分入为体力劳动培训的学徒班，因为新加坡仍需要熟练工人。双语制的政策规定每个孩子必须能熟练使用母语和另一种语言——大都为英语、新加坡的官方语言则为中文、泰米尔语和马来语。

——摘译自英·《新加坡的故事》